

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与清初学术主流： 论清初新理学

王 坚

摘 要:明清学术转向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从理学到考据学的“一步到位”,而是先由明代学术激变出“清初新理学”,再由之蜕变出清代理学、考据学、桐城派等清学各派的“二次转换”。以清初遗民集团为主体的清初理学家基于理学基本价值关怀,一反晚明从理学教条出发的治学思路,推崇以问题为导向,兼容并包,致力于中国17世纪危机的解决及理学基本价值与社会现实的再平衡,“清初新理学”应运而生。“清初新理学”是清初时代主题在学术上的反映,是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是清初学术主流、清学各派的源头,对清初政治,特别是满人统治集团的汉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时代主题及地域学术格局的变动,清初和晚清以来主流学界对清初新理学建构出两种图景,前者以孙奇逢、黄宗羲、李颀“三大儒”为领军,后者重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

关键词:清初新理学;明清学术转向;清初遗民集团;清初“三大儒”

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上承宋明,下开康雍乾嘉,流风所及深刻影响到近代中国之建构,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作为这次大变革的思想结晶,清初学术广受瞩目,但基于线性进化论思维,20世纪主流学界很多时候把理学、考据学分别视为宋明两朝和清代的学术主流,把作为整体的明清学术转向狭隘理解为从宋明理学转向清代考据学,把理学危机、考据学兴起作为清初学术的主题。

实际上,儒学是内圣与外王并举、形上与形下并重的学术体系,基于不同社会形势和时代主题,会产生不同的学术形态,其发展远非线性进化所能概括。明清时代学派林立,学术具有多重面向。单就理学来说,理学在宋明成就辉煌,但作为意识形态,在清代影响也毫不逊色。在帝王层面,清代帝王无不重视理学,康熙帝称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谕旨朱熹牌位从孔庙东庑移至大成殿,配祀“十哲”之列,对其尊奉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官僚层面,“理学名臣”辈出,清代理学在经世致用方面非常具有特色,出现了一批如陆陇其、汤斌、张伯行、陈廷敬等在社会和学界相当有影响的“理学名臣”,就是撰《国朝汉学师承记》而挑起汉宋之争的江藩,也称赞他们是清朝儒学代表人物,对社会影响巨大,“国朝儒林代不乏人,如汤文正、魏果敏、李文贞、熊文端、张清恪、朱文端、杨文定、孙文定、蔡文勤、雷副宪、陈文恭、王文端,或登台辅,或居卿贰,以大儒为名臣。其政术之施于朝廷。达于伦物者”^①;在学术思想层面,理学也处于“共识”地位。“清代理学虽云衰歇,而程朱一派之潜势力未尝一日衰也,夫村塾蒙师,几无一不知有程朱《章句集注》者矣。”^②反倒是被现代人推崇为清学主流的考据学,由于琐碎、脱离实际等弊端,在社会上发展困难重重,“盖汉

作者简介:王坚,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河北石家庄 05002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晚清民国中州理学研究”(17BZS078)的阶段性成果。

① 江藩著,钟哲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4页。

② 萧一山:《清代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96页。

学之词举世视为无用,舍闭关却扫外,其学仅足以授徒。若校勘金石,足以备公卿之役,而不足以备公卿之欢。……欲得帝王之尊,必先伪托宋学以自固。故治宋学者,上之可以备公卿,下之可以得崇衒”^①。

由于明清学术的多重面向,明清学术转向是经、史、子、集等各种知识门类的整体性转向,既非线性进化,更非狭隘的从宋明理学转向清代考据学或理学、考据学、“尊德行”、“道问学”等某个领域的变化。其中,理学虽然遇到危机,却并非无药可救,兼容并包的“清初新理学”应运而生,成为清初学术主流和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清学各派的源头。换言之,明清学术转向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从理学到考据学的“一步到位”,而是分为“两步走”:在明清之际社会危机中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初新理学”,再从“清初新理学”中蜕变出清代理学、考据学、桐城派等清学各派。反映在政治上,“清初新理学”对清初政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明清鼎革、满汉冲突与理学危机:“清初新理学”的生成背景

“清初新理学”的生成,是明清之际社会现实与学术格局等因素综合作用之结果。在清初各方博弈及明清学术转向的“乱世”中,南明及农民军对局势缺乏掌控,清政府具有不断汉化的制度设计却推行民族压迫的两面性,清初理学家基于理学的基本价值关怀,一反晚明从理学教条出发的治学思路,推崇以问题为导向,致力于中国 17 世纪危机的解决及理学基本价值与社会现实的再平衡,从而形成“清初新理学”。

任何一种学说的发展,不但需要基本经典体系和传承该学说的知识群体,更需要基本价值理念的强大支撑。就儒学来说,亦是如此。特别是在皇权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制度设计中,虽然儒家从诸子百家中一个有影响的学派成为控制“一般思想”的大一统中华帝国意识形态,儒生集团成为知识人及帝国官僚的主体,但儒学也时刻面临着皇权的侵蚀和异化,因此,在与皇权不断互动中,儒学基本价值的凝聚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儒学基本价值,历代大儒皆有阐发。孔子以复兴周礼为己任,并表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礼记·大学》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理学产生后,则是形成了体现儒学基本价值关怀的“道统说”。

道统,即“道”传承的统序。道统观念是儒家本有的一种观念。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谱系在《论语》中初步形成,在《孟子》中定型。《礼记·中庸》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六人“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又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到《孟子·离娄上》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汉书·艺文志》总结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属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②就理学来说,道统论核心目标即张载概括的“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③,基本内容是根植于朱熹在《大学章句》中阐述的“三纲领八条目”,即“大学之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之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④,换言之,就是在与皇权互动中以理学基本价值来改造社会。这种改造活动,在清初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明亡后,明朝官绅拥立明宗室建立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政权、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史称“南明”。南明各朝腐败不堪,内部党争不断,外部军阀跋扈,内讧不断^⑤。如弘光朝,“弘光朝廷当

① 刘师培:《清儒得失论》,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48页。

②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8页。

③ 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子语录》,《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20页。

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3页。

⑤ 参见顾诚:《南明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

国的整整一年时间里,正处于内忧外患日益加深之际,君臣上下有可为而不为,朝野人士不仅没有因北都的覆亡而振作起来,反而在腐败、内讧、争权夺利上远远超过了崇祯时期”^①。因此,弘光帝初立时,“都人忻忻,谓中兴可待。不数月,大失望,有苏台麋鹿之惧”^②。据称,当时“民间传诵京中有《西江月》词一阙云:‘弓箭不如私荐,人材怎比钱财?吏兵两部挂招牌,文武官员出卖。四镇按兵不举,东奴西寇齐来。虚传阁部过江淮,天子烧刀醉坏。’”^③

南明固然无力重整山河,而农民军在对时局的把握与现实行动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张献忠屠川自不待言,李自成对儒生亦采取拒绝排斥态度。崇祯十五年(1642)春,李自攻破襄城后对帮助明军守城的儒生大加报复,“深恨诸生,遂剗削百九十人”^④。在进军北京前后,人心思变,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明廷在京官员更是“衣冠介冑,叛降如云”^⑤,但李自成仍对这些高层儒生心存疑忌,不但在管辖区内继续追赃助饷,使更多官僚家破人亡,而且也只录用四品以下的明朝降官,“三品以上独用故侍郎侯恂”^⑥。因为李自成并没有依据形势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调整,儒生们很快转向其对立面。清军入关后,明朝官吏与之配合,农民军一触即溃,李自成不知所终,张献忠阵亡。

与南明及农民军的上述认识和行动形成鲜明对比,清朝对时局却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在北京失陷前后,清政府一方面趁火打劫,欲与李自成合作,“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⑦,另一方面招降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积极筹备南下。入关后,清朝手段更加成熟,入关伊始就以“复父君仇”相号召,把明朝文官武将的仇恨集中到农民军身上,其后,吊民伐罪、为崇祯帝报仇、推行开垦荒地、招抚流亡、蠲免归降地区钱粮、开科举、表忠节以励风化等一系列措施随之展开,使汉族士大夫的对立情绪逐步软化。比如在清兵占领北京后,相当一批汉族官绅出于民族隔阂不愿出任清朝,纷纷南下。为此,清政府利用忠君观念,以为崇祯帝复仇讨贼自我标榜,进京后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輿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⑧。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李自成,清军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朝绅荡涤前秽”,“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⑨,不久又进一步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⑩。

与一时策略相伴随的,是清朝入关后的加速汉化。清朝虽然起源东北,却也受到汉文化不小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清帝国扩张不断增大^⑪。努尔哈赤虽出身于女真贵族,但从小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且一度为明辽东总兵李成梁义子,创业之初,跟随其出生入死的嫡系“古出”(gucu)就有“胡化汉人”。到皇太极时,废除努尔哈赤晚年确定的八家“共治国政”制度,1636年更是宣布放弃汗号,接受汉族帝制,在八旗制度外建六部、内三院、都察院等机构,作为立国之本的八旗被扩编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中汉军八旗就是典型的“胡化汉人”,并出现了象范文程等对清朝产生重大影响的“胡化汉人”。入关后,清朝全面接受明帝国制度设计,并在皇权主导下不断地对

① 顾诚:《南明史》,第143页。

② 谈迁:《枣林杂俎》仁集《女伎》,清钞本,第71页。

③ 姚廷遴:《历年纪》,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5页。

④ 张岱:《石匱书后集》卷一,清钞本,第23页。

⑤ 陈方策:《上督师史相公书》,冯梦龙编:《甲申纪事》卷十一,明弘光元年(1645)刻本,第135页。

⑥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699页。

⑦ 《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郑天挺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455页。

⑧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二》,清光绪十年(1884)长沙王氏刻本,第294页。

⑨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二》,第294页。

⑩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三》,第314页。

⑪ 参见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八旗制度加以改造^①。

另一方面,虽然处于不断汉化的过程中,但清朝为满人建立,入关后,又采取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剃发、圈地、投充与“逃人法”。正是这些民族压迫政策,激起汉人不断反抗。在镇压中,清军滥杀无辜,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对此,清政府后来也承认“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②。

与清初混乱社会形势相对应,晚明以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纷争不断的学术格局、从理学教条出发的治学思路,以及不断高涨的党社运动,也对清初儒生提出挑战。

当理学发展到了明代,八股的惯性使程朱派把程朱言论当成实际最大权威,明初大儒薛瑄说“自考亭(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述,直须躬行耳”^③。“只说孔子错,不认程朱非”成为对他们的典型概括,到了明代中后期,在思想领域,各派儒生都各辟蹊径开始对程朱理学进行批判与重建,最终,以王阳明为宗师的阳明学派把儒学革新运动推向高潮。为了争夺话语权,各方理学家在治学思路上热衷于从本派教条出发,党同伐异,程朱派理学家动辄指斥阳明学为“伪学”,直到清初,“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倍程、朱”^④。而崛起的阳明学则唯陆王马首是瞻,阳明后学、黄宗羲老师刘宗周宣称:“良知之教,如日中天。昔人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然使三千年而后,不复生先生,又谁于取日虞渊,洗光咸池乎?”^⑤由此两派儒生攻击不已,势如水火。

与日渐高涨的程朱陆王之争相伴随,晚明理学家掀起大规模的党社运动,坚持“道统”高于“治统”原则,热衷于用严苛的君子小人之争裁量实政,挽救社会危机,典型代表就是东林党。面对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统治者日益昏庸腐败之局面,东林党人积极介入社会,争国本,争三案,反对“三王并封”,争“福王之国”,抨击时弊,又利用京察之机,打击贪官污吏,还反对矿盐税使,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展开斗争。在治学思路上,他们“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济世,即着眼于现实世界的困境,重提学术思想上的道德传统,重树道德伦理上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在善恶、是非、君子与小人之间,二元对立,决不含糊,并进而依此标准,来梳理现实世界,挽救危机”^⑥。所谓“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邪正,系于学术。法度风俗,刑清罚省,进贤退不肖,舍明道则其道无由”^⑦。但在实践中,东林党人虽义正辞严,占领社会舆论最高点,却过度泛道德论,落实于社会具体事务,则缺乏操作性,除清议论政外,别无他法,对于反对者或政见不合者,门户森严,动辄以苛刻道德标准要求,也同样得罪了其他大批非东林党官员,结果只能是眼高手低,激化矛盾,导致晚明党争愈演愈烈,玉石俱焚。“在万历年间,东林和三党之争,他们所争的有宗旨,有目标。到了魏阉专权以后,他们好像闹家务,目标和宗旨都完全失去”^⑧。

概言之,就清初形势来看,时代主题在于群雄逐鹿,争夺天下。南明、清、农民军及其余部等势力你来我往,各派势力只凭自身力量都难以统一全国,因此合纵连横,勾心斗角,最终清政府以武力统一全国。清政府虽不断汉化,但由于是满人建立,故清初表现出不断汉化的制度设计,同时推行民族压迫的两面性,内部满洲旧制与不断汉化的制度设计冲突不断,对清初汉族士人来说,在军事斗争失败的情况下,以文化的力量汉化清政府,进而缓解清初高位运行的民族压迫,成为时代课题。就学术格局上看,明清学术转换虽然不断深入,但也导致士人内部纷争不断,党社运动高涨,各自为战,因此

① 参见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3-559页;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②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二十六》,第600页。

③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薛瑄传》,第7229页。

④ 陈确:《与黄太冲书》,《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7页。

⑤ 刘宗周:《重刻阳明先生传习录序》,王守仁撰,吴光等点校:《王阳明全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788页。

⑥ 夏维中:《关于东林党的几点思考》,《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⑦ 《东林书院志》整理委员会整理:《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56页。

⑧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页。

建构出一种大家都认同的新体系以团结士人、汉化异族成为当务之急。正是在这种时代主题下,清初学者纷纷基于不同理学资源转换思路,寻求突破,“清初新理学”应运而生。

二、融内圣外王为一以解决明清之际危机:“清初新理学”的六大特征

作为明清学术转向的桥梁和清初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清初新理学”捍卫理学基本价值,面向广阔的社会现实,以寻求团结士人、汉化异族的新道路为己任。王国维说“国初之学大”^①,钱穆谓“前期清儒思想的新天地”^②,首先就源于这种新理学形塑。

与宋明理学相比,“清初新理学”主要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1. 治学思路,推崇以问题为导向的治学思路,致力于兼容并包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及其他理学派资源,以“义袭”为主,实行扬弃性吸收,不像以前门户森严更多拘泥于“形似”^③;2. 实践着力点方面,致力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而非囿于形而上思辨或伦理教条,从思辨讲学走向功夫论和制度批判,以功夫论和制度批判为基点,内圣与外王统筹,理论创新与道德践履同时展开,形而上“理”与形而下“礼”兼顾。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清初新理学”领军都是学术偶像与道德偶像合一式的人物。

第一,在学风上,兼容并包,文武兼收,侠儒并用。

在北方,孙奇逢“始以豪杰,终以圣贤”^④。明代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乱政,对弹劾其罪恶的诸大臣无情打击,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首当其冲被抓,三人的亲朋好友纷纷逃避,孙奇逢却迎难而上,同鹿正、张果中等联合诸同志积极营救。营救行动虽功败垂成,左、魏、周死于非命,但孙奇逢还是保住了他们的亲人。由于孙奇逢、鹿正、张果中急人所难,“海内高其义,有‘范阳三烈士’之称”^⑤。孙奇逢熟知兵法,在明清交替之际,领导民众抗击各方攻击,确保一方平安。1636年,皇太极称帝,同时派军突破长城,逼近保定,周围城池相继沦陷,但在孙奇逢领导下,容城民众奋起抵抗,得以保存。因此,《明史》直接把孙奇逢定位为“节侠士”^⑥。王余佑“尝受业于孙奇逢,学兵法”^⑦,他“以为真正理学须真实经济以充之”^⑧,撰《乾坤大略》、《十三刀法》等,致力于理学、武学、兵学的会通。《乾坤大略》“是中国兵书史上第一部从初起之兵的角度论述战略原则的军事理论著作”^⑨。《十三刀法》是明清之际刀术代表作之一,在此书中,王余佑提出“以刀引力”的思想,对中国刀术思想有重要影响^⑩。颜李学派更是在夏峰北学基础上把文武兼收、侠儒并用学风推向高潮。颜元指导“凡弟子从游者,则令某也学礼,某也学乐,某也兵农,某也水火,某也兼数艺,某也尤精几艺”^⑪,62岁时建漳南书院,“焉立规制甚宏”,中为“习讲堂”,东西各设三斋,学习内容包括“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及科举知识等^⑫。直到1917年,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中,还对颜元“文而兼武”的学术风格大加赞赏^⑬。

①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83页。

② 钱穆:《前期清儒思想的新天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

③ 陆宝千就注意到清初理学家几乎都深受阳明学浸染,即使反对阳明学者,也是在捍卫“‘王学化’之朱学”。参见陆宝千:《康熙时代之朱学》,《清代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④ 申涵光:《征君孙钟元先生谏词》,《聪山集》卷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3页。

⑤ 魏裔介:《孙征君先生传》,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27页。

⑥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四四《左光斗传》,第6332页。

⑦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四八〇《儒林一·王余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36页。

⑧ 王余佑:《与严佩之》,《五公山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2页。

⑨ 邱心田:《清代一部有特色的战略学著作——王余佑及〈乾坤大略〉述论》,《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

⑩ 王余佑:《太极连环刀法·总论》,见唐豪编:《王五公太极连环刀法》,上海:中国武术学会,1936年。

⑪ 陈山榜、邓子平主编:《颜元文集》(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⑫ 陈山榜、邓子平主编:《颜元文集》(下),第356-357页。

⑬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在南方,黄宗羲一生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①崇祯初年,黄宗羲为父报仇,曾出袖中锥刺阉党许显纯,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清军攻下南京后,鲁王监国,与东林旧人募义兵以图恢复,人称其所部曰“黄氏世忠营”,先后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左副都御史,著《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鲁王宣付史臣颂之浙东。他还曾乞师日本,几经艰险,事卒无成,后以母老,隐居著书。在《王征南墓志铭》中,黄宗羲第一次在中国武术史上阐明了“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的“内家拳”与“勇名天下,主于搏人”的“外家拳”之区别^②。顾炎武,清兵入关后,任南明弘光朝兵部司务,撰《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清军攻陷南京后,顾炎武转投王永祚义军,与归庄联合吴志葵、鲁之屿军队,欲解昆山之围,功败垂成。顾炎武的生母何氏遭清军断去右臂,嗣母王氏绝食而亡,遗命他终身不得事清。顾炎武六谒明孝陵,后因仇家陷害,北上与明遗民孙奇逢、傅山、李颙、李因笃、张尔岐、王弘撰等通气,“遍游黄河以北各省,舍诸华阴,以财力主南北各名都汇券交通,广兴耕牧,垦荒生聚”^③。王夫之,顺治五年(1648)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朝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

第二,对宋明理学态度上,致力于理学基本价值与社会现实再平衡,重构天人关系、礼理人情关系、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关系,建构新共识以联合更多汉族士人。

如果放宽视野,“清初新理学”家一方面致力于对宋明理学的扬弃,另一方面从时代主题出发,掀起声势浩大的经典回归重释运动,视野从晚明上溯至宋明、汉唐甚至上古三代,为此后思想发展引来了更多“源头活水”。正是这种兼容并包“新理学”的不断诱导,引来了一个汉文化新的拓展期和高峰期。王夫之宗师张载,兼容晚明东林党人及老庄、佛教某些资源,“修正程朱,反对陆王”^④,在历史哲学方面开辟出一片新天地。黄宗羲上承王阳明、刘宗周,下开万斯同、章学诚,谈“盈天地间皆气”^⑤,关注气论,强调融史学于经学,开清代浙东学术先河;由阳明学复活孟子“仁政”理想及重民、天下为公思想,著《明夷待访录》,批判君主专制。顾炎武“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⑥,著《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义理,与黄宗羲通信,表示思想同于《明夷待访录》“十之六七”^⑦。鉴于近百年来对他们已有深入研究,在此,笔者以主流学界不甚注意,但在清初学界影响极大的孙奇逢为例进行说明。

在天人关系上,孙奇逢虽然也讲天人之分,但与传统理学家注重天人之分从而推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思路不同,他更注重在天人之分基础上讲天人合一,进而建立起天、人之间的流通体系。

孙奇逢在天人之分基础上讲天人合一最明显体现在《读易大旨》中。在《读易大旨》中,孙奇逢首先提出了“本来之《易》”与“圣心之《易》”、“无文之《易》”与“有文之《易》”、“画前之《易》”与“画后之《易》”等概念^⑧。在《易》起源上,“与邵雍的解释不同,孙奇逢强调了易的客观来源,天地自然才是易

① 黄炳屋:《黄宗羲年谱·卷首自题》,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② 黄宗羲:《王征南墓志铭》,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南雷诗文集》(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11-314页。

③ 黄嗣艾:《南雷学案》卷五,重庆:正中书局,1947年,第278页。

④ 稽文甫:《船山哲学》,《稽文甫文集》(上),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0页。

⑤ 黄宗羲:《明儒学案·蕺山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八册,第890页。

⑥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鮑琦亭集》卷十二,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7页。

⑦ 黄宗羲:《思旧录·顾炎武》,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391页;顾炎武:《与黄太冲书》,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9页。

⑧ 孙奇逢:《读易大旨》,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2、109-130页。

产生的条件,圣人之易不过是对自然之易的摸写罢了”^①。他认为:“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生万物,此《易》之源也。庖羲氏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始设奇偶二画以象之。二画错而八卦成,八卦错而四图著。图之文不一,阴阳消长之象则一。阴阳消长,天地之变化也。文王重之以尽其变,周、孔系之以效其动,因时就弊,岂能于图外加毫末?”^②进而孙奇逢总结出四种天人关系:天之天、天之人、人之天、人之人,其中“天之天”和“天之人”指客观意义上的自然与人本身,而“人之天”和“人之人”指被人类主观认知的那部分自然与人本身,它代表了人类对自然和人本身的认知水平与局限^③。

在礼、理、人情关系上,孙奇逢一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路,主张在容人情基础上“理”、“礼”合一。

明清鼎革不但是社会大规模混乱,更是伦理道德的沦亡,因中国是特别注重伦理道德之国度,作为对明清之际“乱世”的反动,人伦道德弥漫整个清初社会。作为清初大儒,一方面,孙奇逢亦坚持道德践履,“饥饿穷愁困不倒,声色货利浸不到,死生患难考不倒,人之事毕矣”^④，“内圣之学,舍三纲五常无学术,外王之道,舍三纲五常无道术”^⑤。他一生致力于躬行实践,功夫日趋圣境,为一代楷模。清代济南学者霍炳称“中原文献在夏峰,天下楷模亦在夏峰”^⑥,道光帝称颂他“学术中正醇笃”,“实足扶持名教”^⑦,最终在道光八年(1828)以孙奇逢从祀孔庙。

另一方面,孙奇逢为道德践履找到了一个现实着力点——礼。他复兴了元明以来湮没以久的“三礼学”,“以其对古礼的践履,揭开了清代复兴礼学的序幕”^⑧。

孙奇逢认为,“礼所该甚广,一切法则皆礼也”^⑨,所以,礼是修身治国之本,个人应该谨身守礼。对于家国天下,也要以礼为治国之本:“当其虚,有实之用,此等学术最大!”^⑩“世之治也无他,食以礼而已矣,色以礼而已矣。上之人寡欲清心,下之人安分守法,如所谓疹兄臂而逾东家墙事自无,有人亦共信,而礼之重于天下也,此何待言也,世之乱也,亦无他,食不以礼而已矣,色不以礼而已矣。”^⑪鉴于“自周末文胜而渐趋于靡,遂有以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伪之首也’”的偏见,孙奇逢再三强调:“夫伪岂礼哉?敦厚以崇礼,家庭与朝廷无异,上古与叔季无异,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高皇稽古之意深矣。”^⑫所以,在认同“礼”作用的基础上,他制定一系列“礼”在生活中予以实施,如《孝友堂家规》、《家祭仪注》、《家礼酌》、《苏门会约》等。

应该说,对礼的重视是儒生共同特色。孙奇逢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对礼的建构呈现注重人情,在容人情基础上致力于“理”、“礼”合一。“专务躬行实践,不讲玄妙,不立崖岸,宽和平易,恂悃无华”^⑬。孙奇逢虽然提倡孝亲,表彰节义,但反对不近人情的非常举动,他教导弟子王余佑等“取其近人情者,若残肢体,重伤亲心,不可为训”^⑭。《孝友堂家规》中虽首谈“士节”的培养,“安贫以存士节”,但亦明

① 汪学群:《清初易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3页。

②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三,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595页。

③ 孙奇逢:《读易大旨》,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上),第160页。

④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一,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517页。

⑤ 孙奇逢:《日谱》卷十四,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下),第594页。

⑥ 霍炳:《征君孙先生年谱序》,《征君孙先生年谱》卷上,《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6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576页。

⑦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十六《儒林上一·孙奇逢传》,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241页。

⑧ 林存阳:《清初三礼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2页。

⑨ 孙奇逢:《四书近指及晚年批定四书近指》卷三,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上),第295页。

⑩ 孙奇逢:《四书近指》卷四,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上),第409页。

⑪ 孙奇逢:《日谱》卷九,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下),第362页。

⑫ 孙奇逢:《日谱》卷十五,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下),第613页。

⑬ 稽文甫:《孙夏峰学派的后劲——马平泉的学术》,《稽文甫文集》(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9页。

⑭ 王余佑:《割股说》,《五公山人集》,第175页。

确告诫后世子孙“八口饥寒,治生亦学者所不废”^①。虽然孙奇逢早年在家乡容城亲自领导抗清运动,局势日渐稳定后,不惜举家迁移河南,高卧不出,但他与魏裔介、魏象枢等清朝大批高官,薛所蕴、曹溶、孙承泽等贰臣却交往不辍。《清史列传》本传说他凡是“有问学者随其高下浅深,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庸行。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野人、牧竖、武夫、悍卒,壹以诚意接之”^②。甚至那些远在千里,跨州隔省的人,风闻其义偶一相接,也会身受感召深服其学。

在会通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方面,鉴于晚明两派不断纷争的状况,孙奇逢率先跳出狭窄的理学视野,在理学视野与整体儒学视野的互动中,在回归、重释孔孟经典基础上,对理学进行新建构。他超越宋明理学,重构儒学道统,在《理学宗传》中,以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阳明、罗洪先、顾宪成十一位理学家为大宗,建构出从上古三代圣王直到晚明东林党领军顾宪成的新道统。在这些道统中,孙奇逢认为最关键的是孔子、颜曾思孟、周程张朱陆王,他们是儒学精髓的主要体现者。“窃尝论之,学以孔子为昆仑,颜曾思孟则五岳四渎也,濂溪以周,伊洛以程,横渠以张,紫阳以朱,象山以陆,皆能为其山川重,所谓小德川流,总之以海为归宿,其道理虽有迂直达近,朝宗于海则一”^③。除此外,对其他儒生,可能“与圣人端诸微有所不同”,或“区区较量于字句口耳之习”,或“务为新奇以自饰其好高眩外之智”,或“更有以理为入门之障而以顿悟为得道之捷者”,虽然孙奇逢对他们不免有所批评,但还是认为“见不必相同,意不必相非”,承认他们“地各有其人,人各鸣其说,虽见有偏全,识有大小,莫不分圣人之一体焉”而列入儒门^④。

第三,治学思路上,一反晚明从理学教条出发的治学思路,从当时社会形势和时代主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以“新民本”思想致力于中国 17 世纪危机的解决。

从中西历史来看,17 世纪是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⑤。在西方,15、16 世纪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蓬勃向上的经济形势,在 17 世纪突然跌入低谷,似乎要返回 14 世纪。西班牙、意大利不断衰落,法国、德意志举步艰难,东欧出现返回奴隶制现象。因此,现代西方著名学者沃勒斯坦在其《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就以“17 世纪危机?”为序言标题^⑥。在中国,内部表现为剧烈的明清鼎革。先是明朝内部,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农民起义席卷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及四川等广大地区。随后清军入关,以武力为后盾将南明、农民军及随后的三藩等各种势力各个击破,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收复台湾后,才走向安定;外部,明朝周边地域环境恶化。北方,努尔哈赤在 1616 年建立后金,1621 年攻占辽沈,其后不断南下华北;南方,继葡萄牙占领澳门,荷兰、英国等西方殖民者相继到来,荷兰更是占领台湾 38 年之久(1626—1662)。总之,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等成为 17 世纪东西方的普遍现象。

学术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特别是在帝制中国,巨大的社会危机往往会伴随着学术的剧烈转向。明清学术转向就是中国 17 世纪危机的学术反映。随着局势日渐稳定,“清初新理学”各派面向 17 世纪危机诱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本身,以问题为导向,以“新民本”思想致力于中国 17 世纪危机的解决。他们批判君主专制,建构出一系列重建方案。他们以天下为公、君臣共治为基础,讨论“治人”与“治法”、士农工商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讨论封建、郡县、建都、兵制、学校、置相、阉宦、井田、科举、田制及财政制度^⑦。对于他们的探索,有学者认为是可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比拟的“轴心突破”^⑧。

①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十一,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 854—855 页。

②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十六《儒林上一·孙奇逢传》,第 5240 页。

③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四,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 614 页。

④ 孙奇逢:《理学宗传·序一》,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上),第 621 页。

⑤ 国外相关讨论,参见董建中主编:《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

⑥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郭方、吴必康、钟伟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 页。

⑦ 参见陆宝千:《清代思想史》,第 1—118 页。

⑧ [美]魏斐德:《明清更替:十七世纪危机或轴心突破》,《中国学术》第十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1—18 页。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在帝制中国时代,由于政治话语大多围绕君主展开,“二千余年之政论,大体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①,所以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单刀直入,以新民本思想在君、臣、法等多个维度解构君主专制,针对性形成“天下为公”、君臣共治、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三大原则。

黄宗羲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为兴利除弊,三代圣王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所以,三代圣王本质上与普通人相类,能为万世楷模,在于大公无私。也就是说,在君主与天下关系上,应是天下为先,君主为后,君主为天下之大公服务,“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三代之后,这种关系发生逆转,“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正是由于君道扭曲,君主们“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②。与此相伴,由于天下君主私有所带来的巨大诱惑,斗争此起彼伏,期间失败者如崇祯帝家破人亡,祸及子孙。

既然在三代后,君道扭曲,那么臣道亦存在问题。黄宗羲认为,君主本质是为天下服务,权力系统中大小官员职责亦在于此。虽然流俗以臣、子并称,但君臣非父子而似师友,“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③。大臣不应成为君主之私匿,亦不能以奴才自居,君臣只是治理天下的不同层次,没有等级高下之分,君臣共治才是真正的为臣之道。“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④。

三代之后君臣之道皆出现扭曲,则以之为核心的治理之法也肯定与三代有异。黄宗羲认为,以“公天下”标准衡量,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换句话说,三代之法为公,而后代为一己之私,后代之法虽陈陈相因却是“藏天下于筐篋”的“非法之法”^⑤,即使历代所标榜的“法祖”的“祖宗之法”,也不免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只有拨乱反正,尽废家天下之制度以恢复三代之制,否则“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⑥。

在批判皇权专制后,黄宗羲依照三大法则勾画理想社会蓝图:既然天下为公,则不得不重定都城,复三代封建、井田、学校诸制;既然君臣共治,则不得不置相、改革胥吏阍宦制度及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既然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则不得不改革选举、兵制、田制及财政制度。他主张:1. 迁都,他认为明亡国之速远远超出预料,建都北京是一重要原因,因此应定都南京;2. 改革学校制度,使儒生们成为官僚的后备队和深入参与社会运转并且保证儒家伦理得以贯彻的知识精英;3. 改革兵制,实行兵民合一,文武合为一,重视武将选拔;4. 改革田制,逆转“黄宗羲定律”^⑦,利用国家权力直接向民众授田,同时土地分等,实行实物征税,简化税种;5. 改革晚明皇权官僚体制和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在

①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589页。

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2页。

③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5页。

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8页。

⑤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6—7页。

⑥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7页。

⑦ “黄宗羲定律”是由现代学者秦晖、王家范、谢天佑等依据黄宗羲相关论述而总结出来的关于中国税费改革的某种历史规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改革之后,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参见秦晖:《“农民负担”问题的发展趋势——清华大学学生农村调查报告之研究(四)》,《改革》1997年第2期;王家范、谢天佑:《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辑刊》第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页。

中央重建相权以分权君主,在边境设置统摄军事和民政的方镇,在无需恢复封建制的情况下,部分实现封建精神。

第四,民族思想上,夷夏之辨思想高涨。

在清政府野蛮的民族压迫之下,作为反抗,“华夷之辨”也成为“清初新理学”焦点之一。其中以王夫之最为彻底,但在清代影响最为轰动的却是吕留良。

吕留良学宗程朱,严守“华夷之辨”高于“君臣之义”的宗旨。他认为“华夷之辨”为儒学最高宗旨,是孔子作《春秋》“微言大义”所在。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后来又辅佐先前仇敌公子小白,即齐桓公,孔子不但不以为意,反而因为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中原免于“被发左衽”(《论语·宪问》),称赞管仲有仁义之美^①。吕留良的这种民族思想传播广泛,到雍正朝,湖南儒生曾静受其影响,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事迹暴露,雍正帝钦定吕留良为“大逆”,亲撰《大义觉迷录》对之进行全面批驳,将吕留良著作尽行焚毁,对吕留良剖棺戮尸,子孙及门人等或戮尸,或斩首,或流徙为奴,罹难之酷烈,为清代文字狱之首。

王夫之专门撰写《黄书》梳理汉族历史。他认为,虽然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在文明初期可能与夷狄相类,但汉族形成后,华夷之间就有天然的文明分野,各民族都要恪守发源之地,不相杂糅,并且一旦脱离祖居之地,就不可避免地衰亡。同时,由于华夷文明分野,两者道德不能混淆,汉族的忠孝仁义不能施之于夷狄:“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②并且,汉族不应停止对夷狄的反击:“天下之大防,人禽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统,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况仅王导之与庾亮争权势而分水火哉!”^③

第五,道统与治统关系上,面对清初满、汉冲突严重但清政府逐渐汉化的现实,“清初新理学”一方面坚持道统的至高地位,但也注意协调与治统关系,甚至向清政府让步,使两者矛盾不至如晚明激化,另一方面联合更多的汉族士人,推进满人汉化。

清初是中国实学思潮高涨的一个时代,这时期实学思潮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外王,注重经世致用。而要经世致用,在皇权社会,依靠皇权成为不二法门,所谓“得君行道”是也。在清政府统治日渐稳固的大趋势下,虽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和由于民族压迫所导致的夷夏之辨思想盛行,但要经世致用,却最终不免向清政府低头。清初禁止集会结社讲学,兴“科场案”、“通海案”、“奏销案”、“哭庙案”、庄廷钺《明史》案、《南山集》案,甚至对当时大儒孙奇逢、顾炎武、傅山等亦有文字狱,虽有魏裔介、魏象枢、叶方蔼等大臣参与救援,但学界基本就范,反映在学术思想上,更有费密直接指出,在帝王之间传承不息的才是“道统”,在圣门师儒之间传授不断的只是“道脉”^④,要实现“王道政治”,最重要还是要依靠帝王。

但另一方面,“清初新理学”各派为加速清朝汉化,联络各方势力,对清政府施加各种影响。为国计民生,他们不但默认弟子门人为清政府效劳,而且对于降清却在社会民生及文化发展方面有实绩的汉官,也交往不辍。比如孙奇逢,虽然早年亲自领导乡人抵抗清朝入侵,但当大势已定后,他率先有意识地推进满人汉化,不但与清朝高官显贵、贰臣保持良好关系,对于那些促进社会民生及文化发展方面有实绩,但道德有所欠缺的人物,多持正面评价,而且还默许弟子从政,培养出像汤斌这样的“理学名臣”,鼓励他们来“正君心”,以推动清政府理学化,恢复理学在意识形态中的正统地位,进而按照儒家传统模式重建清朝社会秩序。所谓“其为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⑤,“今天子宰相,皆有好

① 吕留良:《四书讲义》卷十七,清康熙天盖楼刻本,第159—160页。

②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船山全书》第十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992页。

③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船山全书》第十册,第487页。

④ “帝王然后可言道统”(费密:《弘道书》卷上《弼辅录论》,民国九年怡兰堂刻本,第5页);“孔子欲先王之政教行之于万世而无铎也。乃以为六经传之,而绵绵永存为道脉矣”(费密:《弘道书》卷上《原教》,第2页)。

⑤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七,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731页。

学之意!若以二三君子,启沃于其间,则学之典也,在指顾问矣!”^①

正是在此舆论氛围中,很多降清汉官在清初政学两界纵横捭阖。典型如龚鼎孳,先仕于明,又仕于李自成。降清后,曾保护不少遗民,顺治十二年(1655)十月,有人指控龚鼎孳在都察院对三法司审拟各案,“往往倡为另议,若事系满洲则同满议,附会重律,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②,在执法中偏向汉人,“不思尽心报国”^③,结果降八级调用^④,但因此不少遗民对他有所称赞。吴伟业称赞龚鼎孳为官“唯尽心于所事,庶援手乎斯民”^⑤,钱林《文献征存录》则说“穷交则倾囊囊以恤之,知己则出气力以授之”^⑥。一次,龚鼎孳因与冯铨、刘正宗争门户,冯铨指责龚鼎孳曾接受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多尔袞问是否属实,龚鼎孳竟以唐代名臣魏征自况,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⑦

第六,主体与学术格局上,清初遗民集团是“清初新理学”的主体,清初北方新理学一度引领潮流。

清初遗民集团是清初学术的领军人物、“清初新理学”的主体。一方面,从他们自身来讲,虽然人数不多^⑧,但声望高,名声大,功力深厚,各树道统,占领学术和道德制高点,弟子徒孙遍布朝野且一呼百应,再加上他们大多是侠儒兼收、文武并用式的人物,是“行动中的儒者”,不似后来乾嘉儒生纯以文字为业,因而不难理解他们何以能支配清初学界并被各方尽量拉拢。比如汤斌是孙奇逢著名弟子之一,又是清代重要“理学名臣”。在宦海浮沉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汤斌出任江宁巡抚是其走向人生辉煌的转折点之一。当时,人选很多,汤斌之所以受到康熙帝大力支持,孙奇逢弟子的身份是重要原因。《清史稿》记载:“上曰:‘今以道学名者,言行或相悖。朕闻汤斌从孙奇逢学,有操守,可补江宁巡抚。’”^⑨清初纂修《明史》,聘请当时遗老出山,黄宗羲拒不出山,派弟子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修,自己遥控指挥,修成《明史》底稿,在清代以布衣修前代正史,仅此一例。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西巡陕西,传旨召见李颀。他因病卧床,就派儿子李慎言带上著作《四书反身录》、《二曲集》去见康熙帝。康熙帝深知李颀在士林中名高望重,不好勉强,为笼络天下士大夫之心,亲书“操志高洁”匾额及“御制金山诗幅赐焉”^⑩。另一方面,从当时社会形势来看,在清初乱世中,先是几种势力不断斗争,而后虽总体上逐步朝向有利于清朝的形势演进,但由于局势尚未完全稳定,清廷虽对他们有所敲打,却也有投鼠忌器之虑,再加上清初满人汉化程度低,在思想文化方面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正是这种乱世格局,《清史稿》描述清初儒林状况说:“顺、康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荐,疆吏备礼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颀、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不置,仅命督、抚抄录著书送京师。”^⑪

因为明清大变局在南北存在时间差,南北学术对之反应亦存在相应时间差。具体来说,相对农民起义早在1620年代就爆发于北方,进而攻占北京、灭亡明朝不同,整个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基本上

① 孙奇逢:《日谱》卷三十五,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下),第1351页。

②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二十五》,第584页。

③ 龚鼎孳:《明白回话疏》,《龚端毅公奏疏》卷三,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书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30页。

④ 何龄修、张捷夫:《清代人物传稿》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41页。

⑤ 吴伟业:《题龚芝麓寿序》,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三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04页。

⑥ 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十《龚鼎孳》,清咸丰八年(1858)有嘉树轩刻本,第429页。

⑦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五》,第354页。

⑧ 关于清初明遗民数量,根据各方面估计,大约有2000余人。谢正光、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是现存这方面较为详细的记录,但所收录人数也只有2055人。根据顾炎武统计,晚明生员规模大概为50万(顾炎武:《生员论上》,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第21页),则遗民只占士人总数的4.2%左右。

⑨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二六五《汤斌传》,第9930页。

⑩ 王心敬:《关学续编》卷一,冯从吾撰,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关学编(附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6页。

⑪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〇九《选举志四》,第3183页。

都没有受到农民起义直接影响^①;与1620年代开始清军不断南下,先后数次袭击华北,“总计北掳人口在95万人左右,人畜总数可约达200余万”^②不同,江南地区则是到1645年清军南下攻灭南明弘光朝才开始动荡。换言之,在南北方进入明清鼎革的序列中,北方比江南早近三十年!反映在学术上,首先,清初遗民集团中,北方遗民影响毫不逊色于南方遗民。当时主流学界公认的清初“三大儒”(孙奇逢、黄宗羲、李颀)中,有两位是北方学者,就是顾炎武中年离开江南后,也选择终老北方。其次,在清初,由于北方社会最先崩溃的事实,一方面使得北方知识人率先开始救世浪潮,清初北方新理学异军突起,整个学界为之侧目,其中,以孙奇逢为领军的夏峰北学和以“关中三李”为领军的清代关学两大流派最为耀眼,正是这两大学派深刻形塑了清代北方学术;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明清变革肇始于北方而后向全国扩散的历史情势,使得北方知识界关于明清鼎革的思考先行一步,一旦扩及整个学界也能影响到其他地域学术发展,为他们转向提供借鉴。比如孙奇逢,作为清初北方学界领军之一,以其回归、重释孔孟经典来整合理学各派的内圣思想,和在“舍三纲五常无道术”基础上“礼理合一”的外王思想重构晚明陷入困境的理学,率先为明清学术转向开辟出一条新路,因此被黄宗羲、顾炎武、李颀、张尔岐、傅山等尊为宿儒、老师。黄宗羲编写《明儒学案》,并不讳言深受《理学宗传》启迪。“所著大者有《理学宗传》……可谓别出手眼者矣”,孙奇逢九十岁时作诗寄黄宗羲,“勉以戴山薪传”^③。傅山拜访孙奇逢,一见“诸意全消”,“吾敬之爱之”^④。李颀称孙奇逢“可谓独具双眼,超出门户拘曲之间万万矣”^⑤,顾炎武亲自拜访孙奇逢问学,称颂孙奇逢为海内为数不多“人师”,认为他的一举一动关乎学术气运的升降,地位相当于汉初传《尚书》的伏生和汉末经学大师郑玄,在中原地区更相当于孔子:“海内人师少,中原世运屯”,“名高悬白日,道大屈黄巾。卫国容尼父,燕山住子春”,“伏生终入汉,绮里只辞秦”^⑥。因此,在对“清初新理学”研究中,忽视了明清学术转向中的南北方时间差,忽视了清初北方学术,将难以呈现“清初新理学”的完整面貌。

三、推进满人汉化与明清学术转向,缓解清初学术危机:“清初新理学”的影响

作为从两宋衍至当今的儒学形态,理学历经千年而非仅仅局限在宋明,按照理学在宋明、清代、近现代所面临的不同任务及由此不断发生的转向,理学至少可以分为“宋明形态”、“清代形态”和近现代形态。虽然三者有深刻内在联系和前后相承关系,却也表现出迥异的学术旨趣:“宋明形态”属于理学生长期,重思辨,重形而上理论建设,重“理”;“清代形态”属于理学成熟期,重实践,重践履,重下学而上达,重“理”“礼”合一;近现代形态属于理学与现代社会的调试、融合期,注重与西方各种思想,特别是唯心主义体系的融合会通。理学各个形态之间的转换并非一蹴而就,就清初来说,则是在理学从“宋明形态”到“清代形态”的关键点上,为应对困境,理学兼容并包,“清初新理学”应运而生。

“清初新理学”群体是一个声势浩大、连接南北、朝野呼应、相互欣赏扶持的群体,其影响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影响上,着力于对清初满人统治者不断汉化,推动“满汉一体”、“崇儒尊道”等一系列缓和满汉矛盾的制度设计成型;第二,在学术格局上,“清初新理学”是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和清初学术主流、清学各派的源头。

清代满汉关系近十几年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⑦。正如学者们注意到的,清代满汉关系的变化,包含着“满人汉化”和“汉人满化”两大过程。在清军入关前,虽然满人汉化已经开始,但程度相

① 参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299页。

② 谢景芳:《明末皇太极北掳中原人口考实》,《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七《诸儒学案下五》,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八册,第722页。

④ 傅山:《霜红龕集》卷三十八,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8页。

⑤ 李颀著,陈俊民点校:《二曲集》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00页。

⑥ 顾炎武:《赠孙征君奇逢》,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第371页。

⑦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当有限,处于主流的却是“汉人满化”,后金及清政府把掳掠来的汉人、蒙古人等其他民众编入八旗,到皇太极时代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汉军就是“汉人满化”的集中体现。

满人汉化的第一个高潮是在顺、康两朝,“清初新理学”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和学术支持。正是由于“清初新理学”着力于满人汉化,“理学名臣”辈出,不但使得“满人汉化”成为此后满汉关系的主流,而且促使清政府在“首崇满洲”同时,形成了与之并行的“满汉一体”、“崇儒尊道”等缓和满汉矛盾的制度设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 重视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有清一朝尊孔集历代之大成。康熙帝说:“朕惟自古帝王,声教翔洽,风俗茂美,莫不由于崇儒重道。”^①第一次南巡时专程到曲阜孔庙,在大成殿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把“所有曲柄黄盖留供庙庭,四时飨祀陈之”^②,其礼节之隆重,超越历代。同时,康熙帝认为程朱理学是儒学“正传”,他利用国家力量编辑和刊定大量理学著作,重用熊赐履、李光地、汤斌、张伯行等大批理学名臣,以理学精神制定“圣谕十六条”,到雍正朝扩充为《圣谕广训》,作为教化民众的国教,诸如这些措施使理学在康熙时达到清王朝全盛的顶点。2. 保证儒生通过科举制等上升渠道,汉官数量上不低于明朝,在数量上成为清代官员主体。同时为了统合各地差异,兼顾各省特别是边疆各省利益,清廷改革科举制,以均衡各地的科名数额来达到政治势力的合理分配,不但将定额录取从会试后发展到乡试,而且对乡、会试录取名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分省定额录取的办法代替南北卷制度,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寡和文风高下,钦定会试中额。经过改革,较之明代,清代全国科举人才,分布更加平均^③。

由“清初新理学”作为思想动力和学术动力的“满汉一体”、“崇儒尊道”等制度设计,不但使清初高位运行的民族矛盾趋向缓和,反过来又推动满人在制度和文化上更深层汉化。单就上层来说,清廷通过划分“上三旗”和“下五旗”及不断整理旗务等措施,皇权更加稳固,八旗贵族势力日渐衰落,其间虽然引起满人保守势力反扑,但不久即得继续推进。比如顺治帝去世后,满人高层保守势力借其遗诏对顺治朝汉化进行检讨,随后四大臣辅政、鳌拜专权时抵制汉化,但康熙帝在铲除鳌拜后,不但废除逃人、圈地等民族压迫恶政,使高位运行的民族矛盾走向缓和,而且更加重视经筵日讲,康熙十六年(1677),改隔日进为日日进,虽三藩之乱亦未尝中断;接受汉族立储君制度,册封胤初为太子。到雍正朝,面对反对势力,雍正帝更把三纲五常、君臣大义提到“天理”高度,认为三纲五常是人区别于禽兽之根本,君尊臣卑为天经地义:“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④

“清初新理学”汉化满人方面的成效,在与元初蒙古人汉化的对比中,显得更加清晰。同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元朝在统一中国后治理水平远低于清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元朝蒙古掌权者与汉族势力初步合作受挫后抵制汉化。元初虽然亦有遗民高卧不出,但很多儒生却选择对蒙古统治集团妥协,与之合作,元朝蒙古统治集团汉化比较顺利,他们较早注意保护儒学,推动程朱理学上升为官学,与之相应,儒生们也是竭力回应:“修端在金朝灭亡八个月后提出辽、金亦可为正统和尊蒙尊金的观点。郝经则与许衡一唱一和,从道统、君统等理论实践结合的层面推出‘今日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的新认识,使这种华夷正统观念逐步演进升华,影响越来越大,它既敦促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比较积极地吸收汉法,又鼓励广大汉族士大夫打消顾虑,勇敢地参与进入

①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国朝宫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94年,第537页。

② 王嵩儒:《掌故零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81页。

③ 何炳棣:《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王振忠译,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316页。

④ 爱新觉罗·胤禛:《大义觉迷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页。

元朝各级政权,因而逐渐成为元王朝官方和士大夫都能接受的正统观念,无形之中成了忽必烈所建元王朝的政治文化纲领,并构建起了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士大夫的统治体制。”^①但不久因为李璫叛乱,蒙古统治集团转而重用西藏喇嘛和色目人。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委托帝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同年七月,又下令立诸路蒙古字学,专门教授蒙古新字^②。在此情况下,元代儒士处境低下就成为不争事实,“九儒十丐”并非空穴来风。

在很长时间,学界有一种“落后民族武力征服先进民族,但最终会被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征服”的观念,其实,先进民族用文化同化落后民族并非无条件的,元朝汉族同化蒙古人就是一个失败的标本。与元初蒙古人汉化一样,清初满人汉化也是一波三折。先是四大臣辅政、鳌拜专权时抵制汉化,而后三藩之乱,“民心动摇,未知所归”^③,甘肃、江西等地民众重新蓄发易服,清朝统治者对之表示忧虑,康熙帝颇受打击,猜忌汉臣^④,但也只是采取整理旗务、提倡“骑射”等措施延缓汉化潮流,并没有像元朝那样逆转,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清初新理学”在学理上的强大支撑。

在学术格局上,一方面,作为明清学术转向的桥梁、清初学术主流,包括考据学派、清代理学等清学各派皆从“清初新理学”分流而来,所以,清代考据学派尊顾炎武、黄宗羲,清代北学以孙奇逢为开山,关学奉李颙为宗主,桐城派开山方苞虽“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但仍盛称孙奇逢为“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⑤,并为之立传及修订年谱。即使到晚清民初中国学术掀起大规模的现代化浪潮,第一波仍然要先回归“清初新理学”,以对之的扬弃开启对古代中国学术的现代性新论。另一方面,“清初新理学”各派兼容并包,不似后来各派基于不同目的取其一端,而泾渭分明。比如,嘉道年间,随着考据学派日渐高涨,为与理学划清界限,江藩首先打出“汉学”旗帜,在建构清朝“汉学”谱系时,由于不满意“清初新理学”,直接把清初遗民剔除在外,以清代中期闾若璩作为清朝考据学派开山,最后在学界批评压力下,虽然把黄宗羲、顾炎武二人列入汉学体系,但也只是放入卷末,并对他们的学术和人格进行批评。在学术上,江藩认为他们深受理学影响,“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在人格上,江藩则进一步认为他们在明清鼎革之际,抗击清朝,“不顺天命,强挽人心”,是“蛙声之怒”、“螳臂之臂”,局势稳定之后,又不与清政府合作,做遗民,是“周之顽民”,不配入“儒林之传”^⑥,而对于其他清初遗民,江藩则归入与汉学对立的“宋学”。

四、时代主题、地域学术格局变迁与“清初新理学”的两种景象

总的来看,基于时代主题、地域学术格局的变迁,清初和晚清以来主流学界对“清初新理学”建构出两种景象,集中表现就是在对“清初新理学”领军的塑造上,在清初,学界以孙奇逢、黄宗羲、李颙“三大儒”作为领军,20世纪主流学界则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作为清初“三大家”^⑦。

在清朝,由于理学在意识形态中处于核心地位,孙奇逢、黄宗羲、李颙分别为清初北学、南学和关学的领军,他们以学派的力量主导清初学界,其后学延绵不绝。17世纪,魏象枢曾致信李颙说“平生深慕而不获一晤者”的三人是孙奇逢、黄宗羲和李颙,“虽未亲面请教,然而往来有问答,著述有传布,一字一句,都可取之以为典型”^⑧。18世纪,全祖望在为李颙撰写的《二曲先生窆石文》谓:“当时北方

① 李治安:《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

② 宋濂等撰:《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22页。

③ 彭绍升:《李文贞公事状》,见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编:《清文海》第5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602页。

④ 参见姚念慈:《魏象枢独对对玄烨的心理阴影——康熙朝满汉关系释例一》,《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70页。

⑤ 方苞:《重建阳明祠堂记》,刘季高点校:《方苞集》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11页。

⑥ 江藩著,钟哲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第132—133页。

⑦ 张岱年说:“清初时最有名望的三个大儒是:孙奇逢、黄宗羲、李颙,到了清末,人们讲清初三大家,就改成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80页。

⑧ 李颙著,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153页。

则孙先生夏峰,南方则黄先生梨洲,西方则先生,时论以为三大儒”^①。直到晚清,孙奇逢和李颀仍被视为一代学术宗师。比如在河南,当时的理学大师倭仁、李棠阶皆为孙奇逢后学。咸、同年间,方宗诚曾经遍游河南,与河南学术界进行了广泛交往,所见“中州学者,大抵守孙夏峰遗绪”^②。河南各地名儒如毛昶熙、李又哲、王兰广、于锦堂、蒋榛、田致淑等都是李棠阶的弟子,他们几乎都是通过李棠阶而传夏峰之学,如于锦堂年少时“为人笃实,治陆王之学”,而“后谒河朔李文园太常,得孙夏峰汤潜庵之遗教焉”^③。就河北来看,曾国藩甫任直隶总督后,就认为以孙奇逢等为代表,以文武兼收、侠儒并用为特征的河北士风犹存,“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④。就关中来看,《关学续编》认为李颀是清代关学中兴的领军,“盖关中道学之传,自前明冯少墟先生后,寥寥绝响,先生起自孤寒,特振宗风。然论者以为少墟尚处其易,而先生则倍出其难”^⑤。

到晚清,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之一,在中西、新旧、古今之争的认识框架下,流行于清朝的理学日渐不受重视,到20世纪,忽视、否定理学,从思想上认为其反动、为“封建糟粕”逐渐成为学界共识。章太炎在《清儒》中,独赞考据学派,首先否定清代理学,“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⑥。梁启超则发挥说“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不需等到清朝,早在晚明,阳明学“极盛而敝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反封建”不断深入,理学更是人人喊打,当时新派学人所要打倒的“孔家店”,其核心内容就是理学。其间虽有新儒家为之辩解,但否定理学成为20世纪学界主流看法,清代理学更被视为宋明理学余绪,一并被扫地出门。

与反理学相伴随的,则是对清初学术版图的重构。就“清初新理学”来说,其极端表现就是领军从清朝主流学界认为的清初“三大儒”,一变而为20世纪主流学界认可的清初“三大家”。就顾炎武来说,之所以被推为“清学第一人”,其根基在于考据学派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新汉学”的推崇。在清朝初年,顾炎武虽在知识界有重要影响,但地位只能与归庄(1613—1673)并称“归奇顾怪”,随着考据学派兴起,顾炎武地位不断被抬高,大约到嘉、道之间,随着《国史儒林传》成书,在官方功令、政治忌讳和学术思想本身的综合作用中,顾炎武为清朝第一儒者的论断开始出现,但认同者有限。到晚清民国,随着考据学派空前壮大,先是晚清古文经学领军章炳麟慕顾炎武为人事而改名为绛(顾炎武原名顾绛),号“太炎”,与今文经学领军康有为展开经今古文之争,其后《清代学术概论》一锤定音,顾炎武地位成为共识。就黄宗羲来说,他自清初以来始终享有盛名,但各期原因却是不同:在清代,他是明朝遗老、蕺山学派传人;近代以来,则受到浙东学派、江南考据学派的推崇;在排满革命时,因为《明夷待访录》,他又一度被誉为“中国之卢梭”^⑧;进入民国后,学术史大兴,《明儒学案》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学案体体裁,而黄宗羲本人则被认为是上继刘宗周,下开万斯同、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是浙东史学派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⑨;在现代学者眼中,《明夷待访录》又被认为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杰出代表^⑩。

王夫之被偶像化,更多是近现代湖南士人崛起后重塑地域“文化偶像”的产物,因为承载了过多振兴湖湘之学的功能,故最富有戏剧性。与明清江浙学术影响全国不同,湖南学术默默无闻,从咸、

① 全祖望:《二曲先生窆石文》,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237页。

②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3页。

③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第564页。

④ 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李瀚章、李鸿章编纂:《曾国藩全集·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

⑤ 王心敬:《关学续编》卷一,冯从吾撰,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关学编(附续编)》,第87页。

⑥ 章太炎:《清儒》,参看《检论》,《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82页。

⑦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⑧ 朱维铮:《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走出中世纪》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80—88页。

⑨ 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页。

⑩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4—203页。

同年间开始,随着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士人集团崛起,湖湘文化才逐步引人注目。为建构地域文化,王夫之作为可资利用的地方先贤和学术偶像,受到近现代湘人极大关注与推崇。早在晚清,鉴于其著作散落,影响有限的状况,以曾国藩、邓显鹤、欧阳兆熊、彭玉麟为代表的湖湘士人,广泛搜集王夫之遗稿,同时抹黑其他学者,为王夫之抬身价,比如彭玉麟在1885年请改建船山书院,就把王夫之与孙奇逢、黄宗羲、李颙、顾炎武相比较,批评后四人称“皆肥遁自甘,为辞微辟,然荐绅多从之游,著述亦行于世,名称稍彰”,褒扬王夫之为“之匿韬声,不欲身隐而文著,故世亦鲜知之者”^①。同时,湖湘士人还积极启动王夫之从祀孔庙计划,由于努力无果,便更加广泛地收集王夫之手稿,同治初年汇刊《船山遗书》,合经、史、子、集四部,共58种,另附《校勘记》,光绪十三年(1887)又在湖南船山书院补刻6种,1908年王夫之得以入祀孔庙后,湖湘知识分子更是力图把王夫之思想推向全国。民国初年,湖南出现了一批以刘人熙为代表,以保存国粹、弘扬国学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们创办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在湖南教育文化界产生相当影响。1921年9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船山学社基础上兴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对于这段塑造王夫之的历史,岳麓书社主持新版《船山全书》编者也并不讳言^②。

根据笔者所见,把顾、黄、王三者由分到合进而并称,是江浙和湖湘两大知识群体为了提请三人从祀孔庙以光大本地域学术的诉求联合运作的结果。之所以必须把三者并提,一方面,是像孙奇逢、汤斌、张伯行、王建常等清代北方学派的“偶像”已经从祀孔庙^③,另一方面,也在于仅仅单个报请顾、黄、王三者任何一人都难以通过,不得已只好把三人合在一起以增加影响力。正是由于这种策略上的成功,在江浙和湖湘儒生的联合声援下,三人才得以顺利从祀,但鉴于从祀孔庙与否的决定权取决于清政府,所以从提议到最终从祀历时五十年,三者排序也由先前联合奏请的王、黄、顾由清政府一锤定音更改为顾、黄、王^④。

如果更深入地分析,则可以看到,这种清初学术版图及领军重构的背后,所反映的是清朝以来地域学术格局上的巨大变迁。在清初,由于明清大变局首先是从北方爆发,由北向南逐步推进,所以清初学术格局中,北方新理学异军突起,一度引领潮流,反映在领军人物上就是清初三大家中,北方儒者居其二。自晚清以来,与社会变迁相同步,学术格局亦发生重大变革:自乾嘉时期始,两湖、广东地域知识人开始崛起,近代以来,与原有就相当兴盛的江浙地区遥相呼应,形成了以江浙地区为中心和以广州—长沙—武汉为一线的两大“人才带”^⑤。这两大人才带建构地域文化和相关学派的强烈意识,深深隐藏在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背后^⑥。在此过程中,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作为可资利用的学术偶像和地域先贤,倍受近代江浙、湖湘知识人关注,这些知识人依据时代主题对顾、黄、王等相关思想遗产不断阐释,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学术之建构,进而不断参与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再生产。清初“三大家”之说,植根于时代主题和地域学术格局,是上述历史与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尽管近现代以来,徐世昌《清儒学案》把孙奇逢等列入清初学术开山,学界还出现了“明末四大儒”、“明末四先生”、“清初四大儒”、“清初五大师”^⑦等种种提法,但却都无法撼动清初“三大家”之说的地位。

[责任编辑 李梅]

① 彭玉麟:《改建船山书院片》,《彭刚直公奏稿》卷六,清光绪十七年(1891)吴下刻本,第38页。

②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船山全书》第十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977页。

③ 在清朝就从祀孔庙的清儒有:陆隄其(1724)、汤斌(1823)、孙奇逢(1828)、张履祥(1871)、陆世仪(1875)、王建常(1875)、张伯行(1875)、顾炎武(1908)、黄宗羲(1908)、王夫之(1908)。

④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八十四《礼志三》,第2538—2539页。

⑤ 参见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总第26期)。

⑥ 参见姜萌:《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⑦ 晚清民国学界有“明末四大儒”、“明末四先生”、“清初四大儒”之说,指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及颜元或黄宗羲、李颙、王夫之、颜元,也有“清初五大师”说,指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朱之瑜、颜元。参见何冠彪:《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香港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59—63页。